

But these critiques should not detract from Paulès's laudable accomplishment. He has crafted a thought-provoking, very readable, and carefully researched volume that adds much-needed depth to the study of opium in Chinese cities. His mastery of Chinese and European archival sources, complemented by a comprehensive examination of the popular press and several eyewitness interviews make even his speculation plausible and well-reasoned. I have particularly enjoyed the innovative structure of the volume, where Paulès takes the analysis deeper into the subject as it progresses, beginning with an overview of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framework that shaped the patterns of opium trafficking and consumption in Canton, then laying out the geography of opium smoking in that city, moving inside the opium houses, using propaganda to explore the general *mentalité* of Republican-era Chinese, and finally figuratively x-raying the individual smoker. The analysis is well done and a very important addition to the scholarship, one that highlights the long-term impact of the 1906 anti-opium campaign in the decades when the opium situation was presumed to have returned to the late Qing status quo. This is a book that can be used extensively in class by undergraduate and graduate students, and challenges scholars of opium to dig deeper.

JOYCE A. MADANCY  
*Union College*

***Merchants of War and Peace: British Knowledge of China in the Making of the Opium War.*** By Song-Chuan Chen.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 ix + 230. \$50.00/HKD375.00.

第一次鴉片戰爭是一個前人已作充分研究的題目，史家提出各種理論解釋戰爭起因，而新近學術成果更作出了多樣的探討。本書作者陳松全，年前方從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轉任英國 Warwick 大學歷史系教席，本書是其2007年劍橋大學博士學位論文修訂後的成果。作者表示，1839年英國外相 Lord Palmerston 決定與遠在五千哩外、大部分英國人幾無所知的中國交戰，主意實來自一群在廣州通商的英國商人。作戰須師出有名，本書根據史實，分析廣州及倫敦英商戰爭論的發展史如何產生有關英國對華的新知識，探察商人和政客如何辨明其軍事行動為正義之戰。全書聚焦於英國私商（不包括東印度公司在內到廣州貿易的英商）及他們與清政府的互動。作者力言他們對華關係的新觀念——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在當日中國唯一的通商口岸廣州發展起來，通過戰爭與中國交往——為開戰本源，成功遊說開戰則為戰爭後面動

力。鴉片貿易雖然引發戰爭，但並非戰爭起因。對主戰派捍衛國家榮譽的論點及詞令背後的動機，作者解構為獲利及自信，國家利益實為其所要的貿易擴張，蓋在廣州通商制度 (Canton System) 脈絡下，他們相信並鼓吹戰爭之外別無選擇的論點。

作者認為整體來看，若非各種因素與完全緊接的時機結合，戰爭或不會發生；因素結合為戰爭提供了必要條件而非原因。其時中英國內都忙於權力鬥爭，致被捲入戰爭漩渦中，兩國政府卻非戰爭的始作俑者。戰爭由在廣州的主戰派英國私商引起，為利益而戰，並以他們所提供的情報為基礎而獲勝。中國強硬派的政策對主戰派的散商來說，可謂正中下懷，有助於創造戰爭的有利條件。本書說明了邊陲的演員如何使大都市和帝國的命運備受極大影響，最初在廣州發展起來的主戰論，變成英國國家的政治決定，也解釋了他們如何令廣州成為對中英關係起決定性作用的對華新認知的主要場域。新的英國對華知識的形成與鴉片戰爭的發動深深纏結。作者對鴉片戰爭如此再解釋：在重要時刻，帝國認同和自由貿易教義形塑主戰派對中英關係的理解，隱藏於國家榮譽與利益等詞令及話語背後，厥為商人及政治人物的獲利日程；面對盤根錯節，由大清支持，與國家安全及官商舊利益秩序攸關的廣州通商制度，他們企望開戰。兩國衝突背後實為大清的舊秩序既得利益，以及英國建立的新秩序利益的碰撞。

全書由八章組成。第一章導論。第二章探討廣州英國僑界 (主戰派及綏靖派) 怎樣利用報刊討論有關中英兩國和自由貿易的問題，並闡述其論點。第三章詳細檢視廣州通商制度，解釋廣州行商企望壟斷歐美貿易和清朝國家安全因素的考慮，如何對十八世紀中葉廣州一口通商制度的建立起著重要作用；通商制度怎樣發展到十九世紀三十年代的方式，以及廣州英商怎樣視為可藉條約將通商制度廢除。第四章說明主戰派如何發動訊息戰，滲入限制訊息交流互動的軟性邊界——廣州通商制度。第五章評估並探察廣州英國僑界在十九世紀二三十年代所出現，在翻譯中怎樣將「夷」字等同或對應「野蠻人」、「陌生人」及「外國人」的辯論這段歷史。第六章追溯廣州英國僑界發展起來的主戰論據，成為英國政府的政策及鴉片戰爭的現實。第七章致力於記載英國民眾的反戰歷史。事實上，與國家榮譽相反，鴉片貿易及隨後的戰爭被英國民眾及印刷傳媒描述為「國家罪孽」和「國家犯罪」，道德上難以辯解。結論一章將廣州通商制度如何在中英兩國產生不同類型的利益秩序，以及鴉片戰爭所代表兩種秩序的衝突作理論探討。

本書篇幅僅230頁，唯明顯建基於豐富史料和結實文獻功夫之上，對國內外相關文獻的掌握相當周延，實非徒知以量及資料堆砌者所能比擬。書中取資的主要原始史料，中外檔案而外，尚有大多數藏於大英圖書館的當日英語報紙和刊物，以及藏於劍橋大學圖書館、倫敦大學東方與非洲研究學院圖書館、牛津大學 Bodleian 圖書館和 Leeds 大學圖書館的廣州外僑界刊行的漢、英語小冊子與書籍出版品。這些小冊子不少鮮為人知，當日廣州英國僑界主戰論者擴大遊說宣傳，向國內執政黨施壓請願，乃是內容珍貴的真正草根性的最原始史料。作者所查閱的外國檔案，包

括存放於大英圖書館和國家檔案館有關東印度公司的書信及官方文件(官方文件還包含行商與廣州東印度公司職員的通信和若干清官方文獻),以及東方與非洲研究學院圖書館的新教傳教士檔案和劍橋大學圖書館的怡和洋行檔案,以至 *Biblioteca Apostolica Vaticana* (梵諦岡宗座圖書館) 一些耶穌會士珍藏。中文檔案部分,作者參考已結集出版的大量有關當日廣州的檔案,又先後兩度到北京第一歷史檔案館查閱未經出版的官方檔案。藏於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原始史料,則在網上檢索使用。有關 1832 年初英人 Hugh Hamilton Lindsay 等到中國沿海調查考察、找尋商機的歷史,書中所引證的前人論著,美中不足的是忽略了中文論著的開山之作——張德昌先生〈胡夏米貨船來華經過及其影響〉一文。<sup>1</sup> 該文最早引用這課題最為直接的原始資料,前一年方出版的許地山所編《達衷集》,甚具學術史意義。

顧名思義,就本書標題所見,和戰兩派商人,以及鴉片戰爭發展過程中英國對華的認知,明顯為書中的討論重點。先前學者對於英國商人幕後策劃對華戰爭活動的歷史論著,或視之為純屬個人立場,對戰爭爆發僅具邊際次要地位,或輕信商人論據的表面意義,無視詞令及話語的背後用心。相當程度上,本書對英國主戰派商人如何在廣州產生新的對華認知,發展開戰論據,並成功地遊說英國政府對華開戰,除了具體而微的剖析,更提出重要新見,是此一論題首部全面而完整的學術論著。

書中顯示英國新的對華認知,厥為主戰派成員在廣州的商貿經驗,對自由貿易意識形態的信奉和對新貿易關係的期待,以及對大英帝國擴張主義的信心的結晶。在此之前,明末清初在朝廷供職的耶穌會士的傳教方法,是將天主教信條與儒家學說融合,這一取徑成為將遠方國度勾畫成完美無缺的王道樂土的強大動力,而直至十八世紀末葉,歐洲在物質資源方面尚落後於中國。耶穌會士所形塑的中國,遂成為啟蒙時代哲學家津津樂道的話題。他們將中國想像成一個由哲學家國王所主宰,輔以理性化官僚制度治理,人所欽羨及仿效的王國,其所描述的形象成為歐洲理解中國的準則。另一方面,廣州英國僑界是耶穌會士之後,唯一與中國持續不斷接觸的歐洲人。處於這獨一無二的地位,他們成為對華知識的新泉源。不同於大多與衣食無缺的中國社會菁英交往的耶穌會士,十九世紀三十年代主戰派商人在廣州所見,則是物質生活及工藝水平都被歐洲文明超越的中國——衰敗、貪腐、暴虐、落後。他們在廣州口岸的負面經驗,改變了他們對中國判斷和觀察的根據。主戰派對文明開化發展的自信,以及作為世界最強大國家公民的身分認同而外,更對身在廣州備受敵視及限制的境況深感屈辱。當對華認知的典範從耶穌會士轉移到廣州英商時,主戰派以 *Canton Register* 為喉舌,散播孤立隔絕的中國市場須向英國開放,對英國官商的百般羞辱須予處理的言論,在廣州展開為戰爭辯護的活動,在英國則採

<sup>1</sup> 《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集刊》第 1 卷第 1 期(1932 年),頁 58–79。

用請願與出版小冊子作為公開活動的手段，以及利用其他個人網絡進行幕後遊說。戰爭起源在於主戰派的行動迫使政府響應。主戰派的勝利主要在於建立新知識典範，成為瞭解中國的參考架構；在中英碰撞中，與中國交往須通過戰爭的觀念成為歷史論述——今後必須從英國的觀點看待及衡量中國，而歷史記取的則是主戰派對中國的負面描述及觀感。

主戰派的故事只是戰爭起源的一半，另一群在廣州名之曰綏靖派的英商則根本反戰。過去因檔案資料闕如，致綏靖派商人的歷史探討備受限制。本書首見以專章旁徵博引，探討他們反戰的歷史。綏靖派創辦的 *Canton Press* 與主戰派出版的 *Canton Register* 展開激烈論戰，鼓吹對華和平交往，認為主權國家有權推行其貿易政策，相信商人在對華貿易時應服從廣州的章則。英國遠征軍1840年夏抵華前，英國反戰活動者用請願、和平集會等形式表達他們的義憤，並撰文表明主戰派的目的在於把鴉片強加於華人，散播中國愛好和平的形象。當1839年與中國開戰成為可想而知的事，鴉片戰爭抑或對華戰爭的舌戰，成為英國國內主戰及反戰兩大陣營之間的另一戰場，黨派政治——Whigs（自由黨前身）及 Tories（托利黨）之爭——則為戰爭命名燃起戰火。主戰團體喜歡稱之為對華戰爭，論據與廣州的主戰派如出一轍。最為堅定的反戰喉舌 *The Spectator*（旁觀者）不但稱之為鴉片戰爭，而且攻擊發起戰爭的執政黨 Whigs 和半心半意反戰的托利黨。<sup>2</sup> 在要求中國償付銷毀的鴉片一事上，主戰團體弄巧反拙，因為不能既要求賠償，同時又說戰爭與鴉片無關。《旁觀者》斷言這是「其起源為鴉片，其結局為鴉片」（whose origin was opium, and whose end is opium）的戰爭，怎能不名之為鴉片戰爭（頁136）？將第一次鴉片戰爭描述為「英國史上的一頁深深污漬」（a deep stain on the page of Britain's history）那樣的措辭（頁144），在意想不到的地方一再重現。關於第一次鴉片戰爭的辯論持續到戰後，並與英國國內所謂第二次鴉片戰爭的輿論交織在一起。使國會議員重新回到戰爭議題並予以譴責者，厥為1842年後在華持續破壞道德的鴉片貿易和印度對鴉片稅入的依賴。著名反戰運動成員 John Bright 將兩次戰爭聯想起來，聲稱華人仇視英人是因第一次鴉片戰爭引起，從而導致第二次鴉片戰爭。第一次鴉片戰爭並非中英之間的衝突，而是不公不義之戰。反戰活動備受支持。儘管正如第一次鴉片戰爭那樣，十九世紀中葉的反戰運動對英國政府開戰的決定，不起甚麼作用；政治人物愈漠視反戰團體，反戰團體愈要把鴉片戰爭當作談論話題。鴉片戰爭之名表達了反戰活動家的挫折及憤怒。主戰派，倫敦、曼徹斯特、利物浦和其他北部工業城市的商人，以及 Whigs 和托利黨政府，都想以對華戰爭之名取代鴉片戰爭，卻徒勞無功。歷史或記不起反戰活動，鴉片戰爭最終卻被描述為英國國家之憾，在這一點上反戰運動取得歷史的實質勝利。

<sup>2</sup> 1841年8月托利黨政府在戰爭到一半上台，使它不得不支持賠償要求及繼續進行戰爭。

作者大處著眼之餘，更從小處入手，宏觀微觀結合，面與點兼顧，對相關議題深入探析，書中第五章即為典範之作。十九世紀二三十年代在廣州的英國人，嘗就十八世紀中葉以降官方公文用以表示歐洲商人身份的「夷」字，應作如何翻譯、是否等同「野蠻人」等問題展開激辯。這段歷史已有研究成果頗為豐碩，作者發前人未發之覆，對主戰及主和兩派商人之間與中英兩國之間話語權掌握之爭，分析入微，證成新說。書中指出從1828年春開始，「夷」等同於野蠻人的爭議，連載於 *Canton Register* 達兩年之久，對主戰論起了煽風點火的重要作用，即便最初存在歧義，一般輿論逐漸轉向於相信「夷」意指野蠻人。其中值得注意的是馬禮遜 (Robert Morrison, 1782–1834) 在十九世紀二三十年代十年間對「夷」的意譯，從「外國人」到「野蠻人」的前後不一；他的改變反映了英國私商在廣州占優勢時變動中的中英關係。1835年後期當「夷」的翻譯問題開始第二回合的辯論時，整個廣州外僑界似乎都同意「夷」意即未開化的野蠻人，即便綏靖派喉舌 *Canton Press* 對為這本身已夠刺耳的名詞理應一戰的看法不以為然，但也同意「夷」等同於「野蠻人」的譯文。譯文爭議在倫敦的對華開戰遊說活動團體及印刷傳媒廣為傳播，構成主戰論的一個主要部份。嗣後兩年，廣州英國僑界經長時間辯論，請教過很多中國教師及引用大量中文經典文本後，收回早前主張，表明他們相信「夷」的正確英譯應是 *stranger* (陌生人) 或 *foreigner* (外國人)。這遲來的結論無助於解決「夷」與「野蠻人」之間等同的問題，或改變1935年後廣為援引「夷」譯為 *barbarian* (野蠻人) 作為開戰的論據。事實上，「夷」字的意義在中文脈絡下更為複雜。清代稱呼西人有三種主要方式：西洋、夷、鬼。十八世紀中葉前，主要指涉歐洲人及物的是表明中性立場的「西洋」這複合詞。十八世紀中葉開始，漸以「夷」取代久用於稱呼歐洲的人及物的「西洋」，成為標準做法。「夷」字再現於官方文件，意味這字不再與滿族統治中國本部的敏感問題聯繫在一起；另一方面，以「夷」指稱歐洲人，流露其時大清發生的政治思想演變，連同中國對歐洲人的觀感。「夷」作為清政府指涉外國人的官僚語言，實順應是時名為「儒家儀式主義」(Confucian ritualism) 的思想趨向：對外關係方面，堅持文明中國與外界的區分，加強對在華外國人的管理，理想的儒家世界序與國家安全會聚，而「夷」的稱號成為清朝另一層軟性邊境。「夷」英譯為 *barbarian* 時，外商及傳教士則從國力、基督教價值、物質進步及啟蒙運動的觀點瞭解「夷」字，雙方各執一詞，徒增各自負面的集體記憶。史家陳寅恪謂：「依照今日訓詁學之標準，凡解釋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sup>3</sup> 本章所言頗能適合陳氏揭示的定義。

對一些人所熟悉的史事，本書從多維視野再加探討，提升其學術意義。茲以廣州通商制度為例說明。安全及經濟考量而外，作者指出廣州通商制度更與其時抬頭

<sup>3</sup> 此二句見陳寅恪致沈兼士函，附錄於沈兼士〈「鬼」字原始意義之試探〉一文之後，載沈兼士(著)，葛信益、啟功(整理)：《沈兼士學術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頁202。

的原教旨主義的儒家學說相結合。當日歐洲向東方特別是印度擴張增強的大環境，安全考量並非空穴來風。這通商制度雖成功地建立一道隱喻性的軟性邊境，卻產生制度上的惰性及自滿，只在體制內透過行商與外人打交道；單從體制的觀點出發，使清朝官僚無視其所面臨的外部威脅。這與通商制度成為廣州英國僑界報紙窮究的話題，官方情報網卻對報界場域情況全無掌握，反差形成強烈對比。

小誤難免，謹就所見，臚列供作者斟酌參考：

正文部分，頁41、45，Fuhuan，實為 Fuheng（傅恆，參見詞彙表，頁193）之誤。頁70，Napuolieng，應作 Napoliweng（拿破戾翁，參見詞彙表，頁194）。頁74、76，Liang Tinglan，當為 Liang Tingnan（梁廷柟，參見詞彙表，頁194）之誤。頁88，*huantianyi*（渾天儀，另詞彙表，頁193），應作 *huntianyi*。頁94，‘foreign merchants’ (*yi*)，應是 (*yishang*) 之誤。頁105、106，Li Hongbing，實為 Li Hongbin（李鴻賓，參見詞彙表，頁194）之誤。頁156，It would take another three decades and the Second Opium War, which brought foreign troops to the gates of the capital, Beijing, three decades 應作 two decades，蓋第一、二次鴉片戰爭爆發，前後相距僅約二十年。頁158，And after 1842 British representatives in China, in the capacity of consuls (and chargé d’affaires after 1861), chargé d’affaires 應改為 ministers，其時各國常駐北京代表為公使，非代辦。

注釋部分，頁164注25，Potter, *Ideographia and Chinese Taste*，Potter 應作 Porter（參見書目，頁215）。頁167注66，Redford, *Manchester Merchants and Foreign Trade*，書目 Redford 著作闕如。頁170注2、5；頁185注55；頁187注89，*International Relations*，應注明為 vol. 1。頁170注7，Gang, *Qing Opening to the Ocean*，Gang 為 Zhao 之誤。頁177注50，For Edwin Steven’s account of the voyage to Fuji，Fuji 實為 Fujian 之誤（參見頁74）。頁181–82注59–61、63–64、66、68、73的 *KXZP*（康熙硃批），經覆核，當為 *KXCHWZPZZHB*（康熙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注65，*YZZP*（雍正硃批）當為 *GZDYZCZZ*（宮中檔雍正朝奏摺）；注60、61，*KXZP*, vol. 2, p. 63 為 64 之誤；*KXZP*, vol. 6, pp. 121–25，121 為 122 之誤；注63，*KXZP*, vol. 7, p. 441 為 440 之誤；注66，*KXZP*, vol. 8, p. 382 為 383 之誤；注67、73，*GZDYZC*, vol. 13 實 vol. 3 之誤；注68，*KXZP*, vol. 8, p. 38 實 383 之誤；注73，*KXZP*, vol. 8, p. 356，vol. 8 實 vol. 7 之誤。

書目部分，頁197，縮寫詞，*KXZP* 及 *YZZP* 應予刪去。頁201，Chang, Hsi-t’ung 應作 Chang, Hsi-t’ung 張錫彤。頁202，Chung, Tan，作者姓名倒置，應更正作 Tan, Chung 譚中；‘Christian Missions and Their Impact to 1900.’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0, . .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出版年分闕如，應補上1978。頁205，Gang, Zhao，姓名倒置，當更正為 Zhao, Gang 趙剛。頁206，Guo Mengliang 郭孟良，. . . *Zhongguo bianjiang shi yanjiu* 中國邊疆史地研究，當作 Guo Mengliang 郭孟良，. . . *Zhongguo bianjiang shidi yanjiu*。頁210，林文忠公日記 . . .

Taipei: Wenhai chubanshe, 1962。按：此書係臺北文海出版社於1974年據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原版翻印，故應作1962; Taipei: Wenhai chubanshe, 1974。

前人對鴉片戰爭的研究，切入角度不一，或認為戰爭是由孤立和蒙昧的中國落後於先進世界而引起，或強調鴉片貿易所扮演的角色，或斷言捍衛英國國家榮譽為戰爭起因，或提出戰爭目的在於發展英國貿易的論據，甚或從其時中英兩國的國內政爭闡釋，雖或言之成理，卻意猶未盡。本書從英國商人主和主戰的論爭切入，探討鴉片戰爭醞釀過程中，新的英國對華認知所扮演的角色，並對話語、觀感和現實錯綜複雜，環環相扣的互動關係，作層層深入及細緻的處理。本書貢獻不在於推翻成說或重建史實，而在於精益求精。作者思想縝密，博觀約取，為中外關係史增添一個周延的解釋。

何漢威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